

论刘国钧先生早期的图书馆学思想

吴稼年 顾焯青

摘 要 刘国钧先生早期的学术思想时段为 1919—1926 年。以新发现的十余部(篇)刘国钧先生早期发表的哲学论著和若干篇图书馆学论文为依据,梳理、分析了刘国钧早期的“自动”、“社会化”、“平民化”及儿童图书馆、图书馆“要素说”等思想的来源,认为刘国钧早期图书馆学思想受约翰·杜威影响很大。图 1。参考文献 31。

关键词 图书馆学史 刘国钧 图书馆学思想 约翰·杜威

分类号 G250.9

ABSTRACT The early stage of Liu Kwoh-chuin's academic thoughts refers to the period from 1919 to 1926. According to Liu Kwoh-chuin's more than ten philosophy treatises that are newly found and some articles on library science published in the early years, the paper analyzes Liu Kwoh-chuin's early thought on library science, such as automation, socialization, civilizationization, children library and the origin of Elements Theory.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John Dewey had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Liu Kwoh-chuin's early ideas on library science. 1 fig. 31 refs.

KEY WORDS History of library science. Liu Kwoh-chuin. Library science thought. John Dewey.

CLASS NUMBER G250.9

中国近代图书馆学术思想史的研究成果,主要是通过通过对近代图书馆学者的论著进行梳理、分析,并通过研究者在哲学思考与理性的评述过程中获得。根据目前业内的研究状况,学者早期学术思想的演变,尤其是在参加图书馆职业之前的学术思想,亟待厘清与研究。刘国钧早期的学术思想研究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 刘国钧早期学术思想时间段

刘国钧于 1915 年进入金陵大学文学院读书,1920 年毕业后留在校图书馆工作;1922 年 8 月赴美留学,攻读哲学学位,同时也学习图书馆学^[1]。据张雨生、戴龙基、杨临明在《刘国钧先生著译系年目录》中统计,自 1919 至 1925 年,刘国钧发表图书馆学论著 6 部(篇)。其中 1923 年发表的《美国公共图书馆概况》和《关于大型图书馆的图书编目工作组织》,开始了在留学时期对美国图书馆事业的介绍,这一风格延续到 1926 年,是年发表了《美国图书馆协会五十周年纪念》、《美国图书馆学教育之新发展》等论文。此外,根据顾焯青近来的搜集,新确认至少有 10

余篇关于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论著未被收入,集中发表的时间是 1919—1922 年。本文将刘国钧的早期学术思想时段确定为 1919—1926 年。需要指出的是,这是以文献发表的时间为标准,在实际的研究工作中,通常是研究在先,论著发表在后。刘国钧回国伊始就已将主要精力放在了研究图书分类与编目等问题上,进入了 he 学术研究生涯的第二个阶段。但是,这方面的成果主要是 1927 年开始发表的,根据学术研究中的“约定”,将其归入第二时期。

2 刘国钧早期论著的主要方向

刘国钧是一早慧者,在大学期间就发表了较多的论著,如果不是具有强烈的求知欲、责任感和惜时如金、善于思考、勤于思考、乐于思考之精神,是不可能达到这一程度的。这一求知欲望和学习精神,正如他在美国学习时所表露的那样:“初到此间,如第一封信所说,习哲学和图书馆两种。一年之间都是如此。好像当初来时的欲望,到此不但不曾满足,而且求知的真欲望,反而更加浓厚一些。”^[2]学习和研究的兴趣

浓厚一些,再浓厚一些,就是此阶段刘国钧的追求。

刘国钧早期发表的论著大致如《实业的民治主义之试验》(衡如,1919)、《保守之心理》(刘衡如,1920)、《中国劳工与美国实业之将来》(衡如,1920)、《新唯实主义发凡》(刘国钧,1920)、《罗素之当初和现在》(刘国钧译,1920)、《演进中的心(一)》(刘国钧译,1921)、《海甫定宗教经验观》(刘国钧,1921)、《杜威论哲学改造》(衡如,1921)、《动的心理学》(刘国钧,1922)、《新历史之精神》(衡如,1922)等;另有《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所载罗素著、刘衡如、吴蔚人译的《政治理想》(1920,1921,1927版),杜威著、刘衡如译的《学校与社会》(1921,1928,1935版),以及《刘国钧先生著译系年目录》中所列者,等等。这些论著在内容上以研究哲学社会科学为主,图书馆为辅。我们深切地感受到刘国钧在对图书馆事业研究之前,其哲学上的理论水平已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且研究范围甚广。

3 约翰·杜威:影响刘国钧早期学术思想的主要人物

对刘国钧影响最大的外国学者是J·杜威。刘国钧于1921年发表了《杜威论哲学改造》之长文,文中开首即直述知识进步的两个途径,哲学改造所提倡的不是旧有知识者的整理、引申,而是“为质的更变。举旧所研究者捐而弃之。以从事新方法新问题”^[3]。这一创新思想影响了刘国钧的一生。文中阐述了杜威的核心思想,“经验即是生活”,生活发生于环境之中,先有环境刺激,后有生活之前进,从而突出了生活中“人”的动物性、社会性特征,进而阐明社会人由经验(生活)——知识——智慧(推理)的知识链构建,知识的作用,不在玄虚、冥想理想世界,而在对于现实世界之影响。进而阐明实验哲学之意义,“人生之目的非求完善,乃求逐渐完善其境遇。故不绝之生长,实为生活中之宗旨。”^[3]教育以不断改造经验为目的,作为民治主义的教育,“无间男女、各族、阶级。此为教育

之真精神。亦即所谓道德的德谟克拉西也。”^[3]哲学的改造,关键是明确在各时代哲学的责任,“阐发日常事故之意义。边联之。显示之。则过渡时代哲学之责任也。”^[3]

这篇文章显示出刘国钧良好的哲学理论基础和敏捷的思想,长文所至,没有任何拖沓,条理清晰,结构严谨,逻辑合理,一气呵成。此时期刘国钧有关哲学方面的文章,都有这些特点。那么,为什么说刘国钧早期主要是受杜威思想的影响呢?杜威生于1859年,在他70岁生日那天(1929年10月18日),美国学术界因他对美国乃至世界学术界的贡献而特意为他举行庆祝活动。刘国钧认为此乃一件大事,特意撰文《杜威的教育学说》,以资纪念其学术思想。“杜威教授在去年已是七十岁了。在他的生辰,十月十八那天,美国许多学者麇集在哥伦比亚大学开会庆祝。”^[4]在会上杜威正式宣布退休而不再教学。由70岁的庆祝会而回忆其60岁的祝寿会,“回忆十年前,他在北平过六十初度之时,教育界也曾举行盛大的宴会,并且那时全国的教育界无不诵读他的言论,受他的影响。”^[4]

杜威是哲学家、社会学家、教育学家,他的主要代表作是《学校与社会》、《民主主义与教育》、《哲学的改造》、《经验和自然》、《逻辑:探究的理论》等^[5]。早在1921年就翻译了杜威代表作《学校与社会》的刘国钧,深谙杜威教育思想之核心,在《杜威的教育学说》中简明扼要地指出,“杜威的教育学说之中心思想,简单的说,教育就是生活,生活就是经验的改造。”^[4]追寻这一中心思想的来源,认为是从杜威的经验观中产生出来的。刘国钧十分深刻地将杜威的实用主义归为由经验观而来,这一观点,是对他1921年所发表的《杜威论哲学改造》一文的主题思想的继续与深化。由此可见,刘国钧对杜威学说的重视,自他开始关注、研究杜威学说之时起,就没有停止过,这是刘国钧受杜威学说的吸引而为。由关注、吸引而引起的研究者必然会受被研究者思想的影响,这种影响决定于研究者的关注度和研究度。刘国钧对杜威思想的关注、研究程度是判断刘国钧早期受杜威思想影响的重要方面,但更主要的是要看其在刘国钧

早期的学术思想中的阐发,这种应用所关注之人的理论与思想并自觉地在研究中加以发挥,才是更为关键之处。

4 刘国钧早期学术思想

4.1 “自动”的思想

在图书馆领域,杜威对刘国钧早期学术思想的影响,主要反映在早期的图书馆学理论研究上。上学期间,在金陵大学图书馆兼职的刘国钧于1919年9月在《世教新潮》上发表了他对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首篇论文《近代图书馆之性质》,开始了他在近代中国图书馆界以特有的哲学思维认识图书馆理论与实践的历程。留校图书馆工作后,于1921年发表了3篇具有开创意义的图书馆学文章,分别是《动的图书馆》、《近代图书馆之性质及功用》、《儿童图书馆和儿童文学》。其中,《近代图书馆之性质及功用》笔者估计是对1919年发表的文章的再认识^①,《儿童图书馆和儿童文学》则又于1922年发表在《教育界》上。在这些文章中,刘国钧以其深邃的思想,深入地阐明了近代图书馆的特征与功用,成为中国近代图书馆理论研究的基石,从此,他在中国图书馆界开始了“世纪大师”^[6]之路,他为当时中国正在进行的“新图书馆运动”提供了理论依据,“这一时期的思潮给刘先生以强烈冲击,使他思想中埋下深刻的民主科学意识”^[7],从而成为他学术研究的起点和契机。

根据目前对刘国钧先生早期思想的研究,在上述三篇文章中主要侧重于后两篇文章的研究,由于《动的图书馆》一文没有选入相关选集再版,因此目前还没有广泛浏览的条件^②。根据

周文骏先生研究,这些文章,包括刘先生以后的一些文章的内容,与印度图书馆学家阮冈纳赞的《图书馆学五法则》一脉相通,颇多相同相似之处,通过两者的对比研究,得出结论:“假如我们把阮冈纳赞公开宣讲图书馆学五法则定在1928年,那么刘国钧的公开表述要早于阮冈纳赞6到7年。”^[8]可见刘国钧先生对图书馆学理论研究起点高,并且站在了当时图书馆学研究的前列。对于一个当时还没有走出国门,对世界先进图书馆管理思想还没有足够感性认识的刘国钧先生,如何会有这么高的起点?他的这一高起点的研究,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是他勤奋阅读国外相关文献而得?不太可能。因为当时介绍到中国来的有关图书馆学先进思想的论著不多,引入的原版文献通常滞后。是受国内新文化运动思潮的影响而来?不完全是。因为当时还没有形成相关的较系统的思想,只能说是民主与科学的提倡,充实和影响了刘国钧先生这方面的意识。笔者分析,主要是受杜威的影响。

杜威到中国演讲,第一站是由日本到上海,在上海稍作休整,作了两场演说,然后经杭州到南京,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作了几次演讲,而后北上。1920年4月到8月中旬,主要是在南京度过。据初步统计,在南京共作了10个专题37场讲演。

杜威在南京的讲演,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是主要场所,《教育哲学》、《哲学史》、《试验论理学》这三个专题30场讲演均在此进行^[9]。由于该校与金陵大学相距甚近,具有哲学兴趣、后赴美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的刘国钧完全可能抓

① 笔者为比较《近代图书馆之性质》与《近代图书馆之性质及功用》两文前后的变化,多方寻找《刘国钧先生著译系年目录》(《一代宗师——纪念刘国钧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附录二)中著录《近代图书馆之性质》一文的出处——《世教新潮》,未果。据笔者请教《刘国钧先生著译系年目录》当年的撰写者之一戴龙基教授和刘国钧先生的研究生侯汉清教授,获悉目录中刘国钧先生早期几篇文章的著录者为已经去世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资料室老资料员,他当年是否见过原文,已无从查考,只能期待日后的发现。另,李钟履先生所编《图书馆学论文索引》(第一辑)(1959年初版)里对此也有著录,且发表时间更精确为1919年9月29日。李钟履先生是否也看到过原文,以及北大资料员著录时是否参考了这个索引,都是待解之谜。这里也借此文,向国内图书馆界同行发出文献协查求助。

② 笔者至今未找到原文,亦向国内图书馆界同行发出文献协查求助。

住这一机遇去聆听哲学家、教育家杜威的讲演。另据有关文献记载,杜威也曾在金陵大学讲学^[10],讲授西洋哲学史^[10-11]。在杜威留华之际就曾草译了其著作《学校与社会》^[12]的刘国钧,时值其毕业前的最后半年,从情理上讲也会去听课。

刘国钧先生在1921年发表的《近代图书馆之性质及功用》一文中,分析出近代图书馆的8种特征,又由8种特征归纳为3种:“故近代图书馆之性质可以三语括之,即:(1)自动……(2)社会化……(3)平民化……。”^[13]何谓“自动”?即不能等读者前来借书,而是要用种种方法引起社会上人人读书之举,即要积极、主动地开展读者工作,想方设法做到以书找人,以人找书。

关于“自动”问题,杜威在华讲演中是比较关注的,仅以“自动”作为讲演主题的就有6次:《教育上的自动》、《学生自动之真义》、《自动的真义》、《自动的研究》、《自动与自治》(3讲)、《自动道德之重要原因》等,在其他讲演中,“自动”一词是出现频率较高者之一。杜威认为,“自动就是自己动作”^[14],真正的自动,是有目的地动作、有意义地动作。并认为自动的三要素是:“(1)发展精神;(2)临机应变;(3)集中力。”^[15]综观刘国钧先生的学术研究,有关“自动”的表述,基本上是在早期的这篇文章中出现,可以认为,杜威关于“自动”的论述给了刘先生灵感,从而带来了后两个关于图书馆性质研究的灵感。因为关于“社会化”和“平民化”的问题,是杜威的教育思想中的核心内容范畴,教育的社会化和平民化正是杜威“科学”与“民主”思想的表现。杜威的“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的理念,完全是一种教育社会化、平民化的理念。刘国钧先生将“自动”作为近代图书馆的首要性质,充分体现出了他对“图书馆是活的、藏书楼是死的”观念的理解。活的图书馆必然以积极主动的工作方式去影响读者,扩大图书馆的影响,使图书馆中的知识犹如喷泉中源源不断的活水去浇灌读者缺乏知识的干涸的心灵。只有在此基础上构建出的社会化、平民化的特征,才形成了近代图书馆的特征。

4.2 社会化、平民化的思想

社会化与平民化的特征,其基本要点是民主制度的建立,在“科学”与“民主”得到极大张扬的时代,杜威的民主与科学的思想又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他在1920年演讲中有4次以“民主”为题,如《科学与德谟克拉西》、《德谟克拉西之意义》、《德谟克拉西的真义》、《德谟克拉西的社会分子应有的性质》,论述了为什么要民主和达到民主的目的及方法。这种民主制度在教育上的功用,是教育全体民众的国家认同感,教育中的男女同校,打破男女界限,“无论贫富贵贱人家的子女都可入学,故消灭阶级的观念,养成平等的社会。”^[16]民主社会的核心问题是“使社会人人都受教育,免除男女贫富贵贱等等差别,无论何人,都予以平等教育的机会。”^[17]杜威大力宣扬“普及教育”和“平民教育”,其目的就是要将人人受教育落在实处,要使学校的生活真正成为社会的生活,“学校即社会”、“学校即生活”。

刘国钧大约从1920年前后就十分关注社会、平民的教育问题,他分析了罗素的教育思想后认为,“罗素在政治上和教育上都是主张个人主义的,……这个个人主义是平民的,不是贵族的”^[18],因此,罗素强调的是平民教育,这种平民的个人主义关注的是生活和社会、人员之间的联系。这种社会化的、平民化的教育思想对刘国钧影响很大,“乃至一切之社会制度,其目的咸在发展个人之能力。俾至于最完满之地位。无间男女,种族,阶级。此为教育之真精神。亦即所谓道德的德谟克拉西也。”^[3]这种思想,对于在图书馆中工作的刘国钧而言,必然会受到极大的影响,学校是社会的中心,而图书馆呢?“盖近世之图书馆渐为社会之中心,凡地方公共团体之集会多半举行于此。”^[13]图书馆为什么会逐渐成为社会中心?根本原因即是实现社会教育之最佳场所,这种社会化、平民化的发展趋势极快,“其始,仅学者与教士,继乃及于教师与学生,后又扩及儿童,今且注意于各种人物:若工人、商人、美术家等,皆图书馆所企图服役者也。”^[13]这种社会化的趋势,是学校教育无法比拟的。图书馆的社会化性质,决定了图书

馆服务对象的“社会化”，在当时社会化的根本落实就是要进一步“平民化”，能否将广大平民吸引为图书馆的服务对象，这是对“自动”和“社会化”性质的直接检验，“故其目的在使凡有阅读之能力者，不问其年龄、阶级与性别之如何，皆得有其适当之读物。苟年龄太幼不能诵读者，则为之备置图画。”^[13]这是一条最初刘国钧从关心哲学研究到关心教育问题的社会化、平民化、普及化，再到图书馆的社会化、平民化的路径，这条轨迹的起始，就是研究哲学问题，研究罗素、杜威等的学说，通过对德谟克拉西这一制度的认识、思考，吸收杜威等的相关思想原料，在思想上建立起了民主的、平等的、社会化的、平民化的教育观念，这一观念，亦是图书馆追求的目标，从而建立起了图书馆性质的理念，即为社会全体民众服务，这一思想在 20 世纪 30 年代进一步得到诠释：“现代图书馆对于阅览人员是无限制的。它是要将知识传播给任何人的；它不愿知识为少数人独占；它极力想法和民众接近。”^[19]

4.3 对儿童图书馆的思考

以往在关注刘国钧学术思想的过程中，总感觉《儿童图书馆和儿童文学》一文比较突兀，在他整个学术生涯中，据目前所能搜集到的论著而言，这是他仅有的一篇关于儿童图书馆研究的论文。他的这一论文质量很高，首次提出了建设图书馆的要素问题，并在以后不断充实、完善，最终成为一种图书馆学理论体系。通过对刘国钧学术思想轨迹的研究，这一问题也就释然了，其主要影响来自于杜威。

19 世纪 80 年代开始，德国和美国等许多国家的教育家采用实验的方法，从事儿童心理和生理的研究工作。美国在 1894 年建立第一个儿童研究协会，并有 23 个州建立了分会^[20]。1909 年，国际儿童研究和实验教育学会在巴黎建立。从 19 世纪 70 年代至 20 世纪 20 年代，实用主义一直是被当作美国的国家哲学。杜威的哲学思想在中国影响并不是很大，但是，教育思想却影响巨大。杜威的学生在杜威来华演讲后，在北京、南京、苏州、上海等地创办了几个“实验学

校”，南京高等师范所附设的实验学校干脆就叫做“杜威学校”^[21]，杜威的学校教育应以“儿童为中心”的观点在当时中国教育思想界引起了共鸣，“学校以儿童为中心，社会以青年为中心，所以最希望学校养成一种有生气的儿童，社会养成一种有生气的青年。”^[22]

受杜威之影响，刘先生翻译了《学校与社会》一书，在此书的“译者识”中，他认为在改造社会的方法中，“最远大而亦最能探究其本原”的是教育，学校是“以培养儿童良好经验为目的而负改造社会”的“重大责任者”，是“为养成儿童之心理与道德之习惯而设置之特殊环境”。随后他介绍了杜威对学校三个最重要职责的论述：①化繁复的社会环境为简单，经整理后能适合于被儿童采纳；②剔除社会环境中的不良分子，以不影响儿童的心理；③调剂社会环境各分子，求得平衡，使儿童能不囿于一小部分习惯，而能与大社会有密切接触。反观国内的学校，先生对这三项职责的实现深表怀疑，“用非所学”，“学非所用”，教育之大病。在教学上也是违背儿童的生活习性和心理特点。儿童是好动的，却“教之以静默”，“逆儿童好具体之兴趣而授以玄虚之课程”。这种现状，学校是难以胜任改造社会重任的。为了改变国内教育的弱点，教育界人士提出了“新教育”的号召，他认为“新教育”精神的实质就是杜威先生在《学校与社会》一书里所提倡的“教育与生活”相结合，“一切设施均宜以儿童为中心而利其天性”。正如杜威在书中所言“当今教育之改革，首在变迁教育之重心……新教育之儿童犹之太阳，一切教育设施皆以环绕儿童为极则，盖儿童固为教育组织之中心也”^{[23]27}。

杜威在《学校与社会》一书中对图书馆也有论及，在第三章《教育中之耗费》（本文均采用刘国钧之译法，后世对该书包括章节在内的文字翻译上均有一些差异）中，杜威以图示的方式阐述了学校系统之间的隔阂，正是这种学制各部分的彼此隔阂、互不相关，导致了学校系统的耗费。杜威仍然运用图示的方式建议各学校与社会相结合^{[23]57}，继之不断运用图示层层论述。在其中一张图示^{[23]61}（见图 1）中，图书馆处于中心

位置,它是“一切智识的资料之有关于实地工作能使之有意义及宽大的价值者之集合所”^{[23]64},图中四个角表示实地练习,中央的表示实际活动的理论。在图示的环境中,对儿童在学习中所带来的各种经验、疑难与见到的特殊事实,加以讨论,以求得新的认识,特别是从他人的经验以及以图书馆为象征的“世界上积蓄之知识”获得新知,以此构成理论与实践的有机联系。读书在教育中的地位可见一斑,尽管以读书代替经验是有害的,但用读书来解释经验,发展经验,则“甚重要也”^{[23]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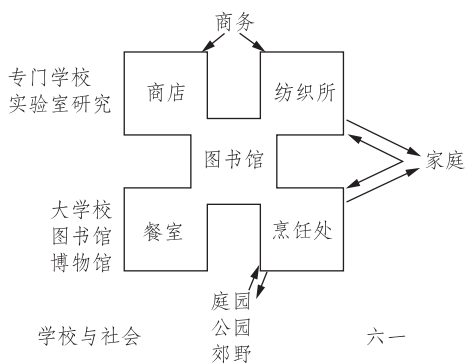


图1 学校与社会

杜威关于儿童教育中心论、自动式教学的思想以及对图书馆功用的论述对刘国钧影响较大。

学校教育应以儿童为中心,学校中所设的图书馆,当然也应儿童为中心。针对当时忽略儿童主动教育的情形,刘国钧深刻地理解了教育的方向,因而产生了“在小学校内,图书馆竟是全为儿童而设”^[24]之说,开创了中国图书馆思想的新起点。学校教育要使儿童“自动”,发展儿童本能的方法包括:游戏、有组织的运动、演戏、工作,儿童图书馆则是培养儿童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培养他们自动选择图书阅读的地方,在儿童图书馆内,“儿童可以自由拣选他所爱看的书,可以自由实行他的志愿”。^[24]由于广义的教育中心任务是要陶冶儿童的习惯和思想,因此,儿童教育与成人教育的目的与方法不同,从图书馆角度出发,儿童图书馆与成人图

书馆的目的与方法当然也就不同。因此,刘先生认为“成人读书,大目的是在得着新知识”,根据此目的,图书馆必须购备最新的书籍,而“儿童读书的大目的,是在陶冶性情,求知识还在其次”,“儿童图书馆的价值是教育的”。为了做好儿童的教育工作,根据当时中国儿童图书馆的实际情况,刘国钧先生进一步提出解决办法,即同市同区的小学联合起来组织儿童图书馆,图书馆中的文献,可以通过巡回的方式达到共享。这是图书馆“自动”、“社会化”、“平民化”的特征在儿童图书馆的反映,是杜威教育思想在儿童图书馆的反映。

4.4 图书馆“要素说”的思想

刘国钧将图书馆作为整个国民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思想,从开始对图书馆研究之时就已确立,“完善的儿童图书馆实在是国民教育所不可少的利器”^[24],进而提出了建立完善的儿童图书馆必须具备的三种要素,他最先以图书馆工作者的身份提出了图书馆的三要素理论。这一要素说理论,更显示出了受杜威思想的影响。

“要素”一词何以会在当时图书馆出现?尽管关于“要素”的研究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都有大量的研究,但是,在当时中国社会上“要素”作为一个较高的词频出现,则主要是受杜威讲学的影响。杜威在中国有关“要素”主题的讲演有3次:《教育之社会的要素》、《教育之心理的要素》、《社会之要素》,前两次是在1921年7月,后一次讲演记录稿经整理后发表在《杜威罗素演讲录合刊》上。尽管杜威在华有关“要素”主题的讲演仅有3次,但在整个两年两个多月的讲演中,“要素”却是一个出现频率比较高的词。1919年5月在南京的多次讲演中,就分别提出了要素问题。杜威认为,“养成共和国之精神,则有二大要素”^[25],共和国之爱国之心,其构成原素非常复杂,细析有三个原则:想象、理想、自动^[26]。平民主义的教育有两个要素^[27]。当年在北京讲演时又提出了民主的“四要素”。进入20世纪20年代,杜威则以要素分析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去研究各种问题,如互助的三要素、共同

生活的要素、民主的三要素、财产为人生之要素、社会要素、新人生观要素、经济要素、求学要素、动作要素、习惯要素、学校教育的三要素、经验三要素、教育三要素、要成为教育领袖的三要素、教育责任者的三要素、自动的三要素、儿童要素等等,其中以论述“三要素”为见长。从刘国钧先生《儿童图书馆和儿童文学》一文中“以儿童为中心培养儿童的阅读兴趣——指导好儿童的阅读环节——儿童图书馆工作人员的要求——组织好儿童图书馆的途径”这一环环相扣的思路,到提出建设儿童图书馆的三要素,具有逻辑上的关联性,其中杜威的思想起了较大的影响。以后,刘国钧先生又分别于1934年提出“四要素”,1957年提出“五要素”,在完善要素说的过程中,杜威的影响始终没有改变。

需要指出的是,要素说作为一种研究问题的方法,刘国钧已十分熟悉。1920年,刘国钧在著译论文中就有“要素”出现,如在翻译罗素的论著时,就有“罗素在他的《伦理学的要素》和《自由人的崇拜》两书内,绝不承认自然世界中有些微人的价值。”^[18]他特意指出的罗素的两本书,按常理是刘国钧应该读过的,因此,对于要素的含义是十分清楚的了。同年,在论述《新唯实主义发凡》一文中,提出“一元论也有根据认识的普遍性底。以为认识是万有存在的要素。新唯实主义反对这一点尤其利害。”^[28]包括在《学校与社会》中亦有“要素”一词出现。介绍刘国钧对要素的论述,根本的一点就是要说明刘国钧在图书馆界的要素说不是突然产生的,而是有其学术思想基础和哲学基础的,这一点对于认识刘国钧要素说十分重要,可以避免以偏概全的认识;同时也说明此时期刘国钧的图书馆学术思想虽然受到杜威的影响很大,但是,这种影响并不代表全部,中国固有的学术思想、当时大量涌入国内的西方学术思想同样对刘国钧的影响很大。

5 结语

J·杜威在新文化运动期间对中国的教育界、哲学界,以至整个学术思想界的影响是巨大

的,这一点已为历史所证实。学界已有研究文献初步论述了J·杜威对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影响^[29],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在第一代图书馆学家中,刘国钧先生受到的影响最为明显。这主要源于其早年对哲学研究的第一偏爱。在学术研究上,早年刘国钧先生对哲学社会科学的热情是高于图书馆学的,J·杜威的学说对他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以至于其赴美继续攻读哲学时还以《约翰·杜威的逻辑学》作为硕士论文^[30]。中国图书馆界之大幸就在于刘国钧先生后来主要致力于图书馆事业,并将其在哲学研究过程中形成的哲学素养深深融入到了图书馆学研究之中,体现了其“逻辑性极强,善于说明事理并提升理论层次”的特点^[31],他对整个中国图书馆学的发展作出了独特而具有标志性的贡献。

(致谢:澳门科技大学图书馆馆长戴龙基教授和南京农业大学侯汉清教授热情回复了笔者有关《刘国钧先生著译系年目录》的疑问。在查找文献的过程中,得到了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2008级硕士生李星星、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2009级博士生周余姣、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王 师的 。在 谢 !)

参考文献:

- [1] 路易斯·S·罗宾斯.“我们永远忘不了你”:刘国钧和威斯康星图书馆学院[G]//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甘肃省图书馆.一代宗师——纪念刘国钧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41-52.
- [2] 会员通讯[J].少年中国,1923,4(6):会员通讯:5-6.
- [3] 衡如.杜威论哲学改造[J].东方杂志,1921,18(8):37-50.
- [4] 刘国钧.杜威的教育学说[J].师大教育丛刊,1930(1):17-22.
- [5] 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缩印本[M].1979年版.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1254.
- [6] 程焕文.北刘南杜 世纪大师——论刘国钧先生在20世纪中国图书馆学术史上的历史地位

- [G]//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甘肃省图书馆.一代宗师——纪念刘国钧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143-152.
- [7] 吴慰慈,等.刘国钧先生生平简介[G]//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甘肃省图书馆.一代宗师——纪念刘国钧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11-15.
- [8] 周文骏.图书馆学一代宗师——略论刘国钧的学术成就[G]//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甘肃省图书馆.一代宗师——纪念刘国钧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16-35.
- [9] 杜威在华讲演目录[G]//袁刚,孙家祥,任丙强.民治主义与现代社会:杜威在华讲演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783-787.
- [10] 沈清松,李杜,蔡仁厚,冯友兰·方东美·唐君毅·牟宗三(中国历代思想家之二十五)[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99:41.
- [11] 李钟梅,王月清.东方诗哲方东美与南大情缘[N].扬子晚报,2008-05-22(B6).
- [12] 刘衡如.译者识[M]//杜威.学校与社会.刘衡如,译.上海:中华书局,1921:译者识页3.
- [13] 刘国钧.近代图书馆之性质及功用[G]//史永元,张树华.刘国钧图书馆学论文选集.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1:1-3.
- [14] 杜威.现代教育的趋势[G]//单中惠,王凤玉.杜威在华教育讲演.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331-335.
- [15] 杜威.“自动”的真义[G]//单中惠,王凤玉.杜威在华教育讲演.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207-208.
- [16] 杜威.美国之民治的发展[G]//袁刚,孙家祥,任丙强.民治主义与现代社会:杜威在华讲演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4-17.
- [17] 杜威.社会之要素[G]//袁刚,孙家祥,任丙强.民治主义与现代社会:杜威在华讲演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34-146.
- [18] Sarab Unna. 罗素之当初和现在[J]. 刘国钧,译.少年中国,1920,2(1):26-35.
- [19] 刘国钧.图书馆学要旨[M].上海:中华书局,1934:7.
- [20] 戴本博.外国教育史(下)[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32.
- [21] 孙家祥.杜威访华与中国现代政治思想演进[G]//袁刚,孙家祥,任丙强.民治主义与现代社会:杜威在华讲演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前言页14.
- [22] 杜威.“自动”的真义[G]//袁刚,孙家祥,任丙强.民治主义与现代社会:杜威在华讲演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07-108.
- [23] 杜威.学校与社会[M].刘衡如,译.上海:中华书局,1921.
- [24] 刘国钧.儿童图书馆和儿童文学[G]//史永元,张树华.刘国钧图书馆学论文选集.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1:4-10.
- [25] 杜威.共和国之精神[G]//袁刚,孙家祥,任丙强.民治主义与现代社会:杜威在华讲演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22-23.
- [26] 杜威.真正之爱国[G]//袁刚,孙家祥,任丙强.民治主义与现代社会:杜威在华讲演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8-21.
- [27] 杜威.平民主义的教育[G]//袁刚,孙家祥,任丙强.民治主义与现代社会:杜威在华讲演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354-359.
- [28] 刘国钧.新唯实主义发凡[J].少年中国,1920,1(11):1-14.
- [29] 吴稼年.J·杜威对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影响[J].国家图书馆学报,2010(3):84-88.
- [30] 魏成刚.论刘国钧先生的学术成就[D].北京: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2008:97.
- [31] 王子舟.图书馆学是什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77.

吴稼年 江南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通讯地址:江苏无锡蠡湖大道1800号。邮编:214122。
顾烨青 江南大学图书馆助理馆员。通讯地址同上。

(收稿日期:2010-11-29;修回日期:2010-12-06)